



无党派阶层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

洛阳外国语学院 徐万胜

内容提要：无党派阶层是促使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955年体制”时期，日渐发展的无党派阶层导致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趋向“非稳定”；冷战后日本的无党派阶层急剧增加且呈“脱党化”倾向；无党派阶层的走向是影响21世纪初期日本政党体制重构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无党派阶层 政党体制 自民党 转型

一 “1955年体制”下的无党派阶层与“政党支持”的非稳定性

战后日本从1955年开始形成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相抗衡的政党体制，俗称“1955年体制”。该体制从形成直至1993年8月自民党政权垮台为止的38年期间，社会党等在野党始终未能取代自民党而执政，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党体制是名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在“1955年体制”时期，无党派阶层是促使日本政党体制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无党派阶层，是以支持政党的程度为依据而进行大致分类的一个选民阶层，通常指社会舆论调查中回答为“无支持政党”和“不明白”者的合计，或者专指“无支持政党”者。关于无党派阶层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各种舆论调查的结果稍有出入。例如，根据时事通讯社的舆论调查，该比例在1960年为25.6%，1971年超过30%，1980年达到35.9%。[1] 根据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1954—1961年间的“无支持政党”阶层在日本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约为40%，20世纪60年代降至30%左右，而70年代以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准，1986年7月无党派阶层所占的比例为39.6%。[2] 另外，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同时显示，从70年代初起无党派阶层呈增加趋势，在发生洛克希德事件的1976年和1979年举行大选时达到最高峰，所不同的是每日新闻社的调查认为在80年代里无党派阶层的比例稍有下降且呈稳定状态，而朝日新闻社的调查则认为在80年代中期无党派阶层又达到一个新高峰。[3] 概而言之，70、80年代里无党派阶层所占比例大约在30%—40%之间。

当然，无党派阶层本身并非专指某一社会阶层，其内涵成分较为复杂，几乎包括各个社会阶层的选民。大体上看，在60年代，无党派阶层的主体是居住在农村、准农村地区文化程度较低的年长者，他们对国家政治持不关心态度，但在大选中易被政治家的“个人后援会”动员起来，将选票投给在地缘、血缘方面密切相关的候选人。从本来意义上讲，他们虽不是政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却是特定的自民党候选人的“固定票”。进入70年代以后，无党派阶层的主体则转换为居住在大城市地区的公司职员，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关心国家政治，但往往并不特意地去支持某一政党。有的学者认为，促使无党派阶层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是由于对政治的有效性持有疑问。在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下，许多选民感到自身的选票无法改变政治现实，与选举手段相比，更加注重通过官僚机构、政治家个人及利益团体等媒介来实现切身利益。其二，是由于政治一体感的淡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个人生活趋于复杂且忙碌，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元化、流动化的发展趋势，使选民特别是大城市地区的选民很难有闲暇形成高度的政治一体感。其三，是由于自民、社会两大政党以外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出现。6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多党化发展进程，使得选民可以在自民、社会两大主要政党以外做出其他选择。[4] 归根到底，新增的无党派阶层与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对执政党的不信任、对现存政党的不信任和对代议制的不信任等。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无党派阶层的不断增加，均意味着该党的固有社会支持基础将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另外，虽然无党派阶层没有明确地表明支持某一特定政党，但并不等于该阶层在大选中就全部弃权。相反，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有相当一部分无党派阶层是参加投票的，且由于其选票投向的不连贯性而使之带有“浮动票”的特点。在无党派阶层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该特点使得各政党在选举投票中所获得的“政党支持”（即得票率）带有一定程度的非稳定性，并导致选民与政党间的关系处于“流动化”状态。

具体而言，参加选举投票的无党派阶层可被视为政党的“潜在支持者”。在自民党执政初期，“无党派阶层”的存在尚未得到明确认可，因为在自民、社会两大政党相抗衡的“保革对立”格局下，“不明白”政治的阶层并不引人注目。从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后期，出于对自民党政权的公害对策、社会福利政策、洛克希德事件、党内派阀斗争加剧等的不满，许多无党派阶层将选票投给了与自民党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其结果是地方选举中“革新首长”不断出现和国政选举中“朝野伯仲”格局的形成。80年代以来，无党派阶层的政治立场开始更多地倾向于自民党。这一时期，自民党的议席与大选的投票率之间具有较明显的正比例关系，例如，根据对1979年、1980年和1983年大选投票结果的分析，自民党绝对得票率与选民弃权率的二者合计比例大体上在66%左右。[5] 其中，在投票率较高的1980年大选中，自民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均大幅度回升，而严重依赖“组织票”的公明党、日本共产党则遭到惨败，其他在野党势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说明在大选中弃权或投票的相当一部分无党派阶层已成为自民党的“潜在支持者”，他们若有所不满则在大选中采取弃权的方式来抵抗自民党政权，一旦参加投票则采取支持自民党的态度。另据1986年5月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对于“您将投票给哪个政党”的提问，32%的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或“其他、无回答”；当被问及“如若必须从现存的政党中进行选择，您将选择哪个政党”时，在先前回答为“无支持政党”者中有65%的选民做出了选择；在最终做出了选择的无党派阶层中，则有54%的选民投票给自民党，22%的选民投票给社会党。[6] 但是，无党派阶层在80年代对自民党政权的“潜在支持”，使自民党在国政选举中所获得的“政党支持”带有相当大程度的非稳定性，在1980年大选、1983年众参两院议员同日选举、1986年众参两院议员同日选举、1989年参议院议员选举及1990年大选中所获得的选举成绩一直处于上下浮动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无党派阶层在众议院议员选举、参议院议员选举和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态度是互有区别的。7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流意识”的影响下，日本多数选民是希望延续自由经济体制、维持现有生活水准的。从这种社会心理出发，在进行政权抉择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无党派阶层的投票是相当谨慎的，对完全否定现存政治体制的政党的支持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而在与政权更迭无直接关联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无党派阶层则可直接发泄其心中的不满，或弃权或将大量选票投给自民党的对抗势力，以便提高自民党执政的危机意识。

二 冷战后无党派阶层的增加及其“脱党化”倾向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上两极冷战格局的解体和日本国内“1955年体制”的崩溃，冷战后日本的无党派阶层数量迅速增加。从90年代中期起，在各种舆论调查中无党派阶层所占的比例大体上维持在55%上下。

同时，与冷战时期的无党派阶层是在保守、革新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相比，冷战后日本的无党派阶层则表现出较强的“脱党化”倾向：首先，是国政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早在1993年7月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已有所表露，尽管正值政界改组，大选投票率却降至战后最低值67.26%。1996年大选是在作为政治改革重要一环的新选举制度下施行的首次大选，但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的投票率分别为59.65%和59.62%，再创战后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率的最低记录。2000年大选是在延长选举时间、首次实行海外投票制度的情况下举行的，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的投票率也仅为62.49%和62.45%。2003年大选是在小泉内阁推行各项改革的关键时期举行的，且被舆论称为进行“政权选择”的大选，但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的投票率只有59.86%和59.81%，稍高于1996年大选而成为战后第二低的大选投票率。参议院议员选举亦是如此。例如，1995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区的投票率再创44.52%的历史最低记录。造成国政选举投票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量无党派阶层拒绝参与政党政治过程而纷纷弃权的结果。

其次，是无党派阶层在地方选举中对现存政党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在1995年4月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无所属候选人在都道府县议会中所占的议席比例激增44%（从409席上升到585席），尤其是在东京、大阪的知事选举中，广大选民拒绝了各政党推荐的候选人，选择了两位出身于演艺界的“非政治性”候选人，二人均缺乏管理政府的经验，无党派阶层的选择标准似乎仅仅是“非政治性”而已。在1999年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以无所属候选人身份参选的石原慎太郎高票当选。另外，对于冷战后无党派阶层的“脱党化”倾向，有的日本学者曾做如下概括：不具有既存政党的党派性和保革意识形态；不以“政党”为基准行动，时常采取独立立场；因时因地采取不同的行动，并视之为正常现象；在自身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不承认“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厌恶不透明、不公正的政党；即使强烈支持某一政党，但在选举来临之际也未必支持该党所属的候选人；具有从与自身“平等”的角度来判断候选人的倾向。[7] 因此，冷战后具有强烈“脱党化”倾向的无党派阶层又被称为“新无党派阶层”。一般认为，90年代前期，日本广大选民“对细川联合政权的较高期待与失望，是这种‘新无党派阶层’产生的发端”[8]。具体而言，冷战后无党派阶层的增加及其“脱党化”倾向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其一，广大选民对“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持批判态度。自1993年8月自民党下台以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也由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进入“多党联合组阁”的联合政权时代。在任何政党都不能在大选中获得过半数议席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及维系政权，各政党之间“合纵连横”而组建联合政权。结果，在9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政党政治是沿着以“自民对非自民”、“小泽（一郎）对反小泽”为对立轴而展开的，各党的基本政策及政治理念却被搁置一边。特别是在1994年6月至1996年1月期间，“1955年体制”下曾长期对立的自民、社会两党竟然联合组建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的内阁，导致两党的部分支持者转而放弃“政党支持”，成为无党派阶层。1996年大选后，自民党在社会、先驱新党两党“阁外合作”的支持下曾一度单独执政。但自民党在199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中遭到惨败后，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联合组建内阁，同年10月又将公明党拉入联合政权。2000年4月，在自由党退出联合政权后，自民党、公明党又与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保守党共同组建联合政权。这样，上述联合政权是在执政各党未经大选“检验”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拼凑”参议院过半数之势而形成的。毫无疑问，在1996年大选及199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是因为“反自民”而投票支持新进党（1996年大选时公明党是新进党的一部分）、公明党、自由党等政党的。这样，各政党“随意”组建联合政权，进一步增加了广大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甚至使选民感觉自己所投的选票被“出卖”了。

其二，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受泡沫经济破灭及其后不良债权的影响，从1991年4月开始，日本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其间，尽管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景气刺激计划，但始终难以奏效。结果，日本经济在1992年度、1993年度连续两年出现GDP增长率仅为0.4%的“零增长”，1998年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在经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银行及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日趋加重。同时，经济长期萧条也促使广大国民的政治意识发生变化，人们对执政的自民党及其他政党逐渐丧失信心，并深感自己的“一票”无法改变日本政治“无能”的现实，最终只有采取远离选举、放弃支持政党的态度。

其三，各政党的重组“过度频繁”。伴随着“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界的重组进程，各政党的“聚散离合”频繁且零乱。其中，1994年12月，由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自由党、未来新党、高志会、改革之会、自由之会等九个在野党派共同创建了“新进党”，但该党仅存续三年。1997年12月，新进党又一分为六，即以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以鹿野道彦为首的“国民之声”、以神崎武法为首的“新党和平”、以白滨良一为首的“黎明俱乐部”、以中野宽成为首的“新党友爱”和以小泽辰男为首的“改革俱乐部”。需要说明的是，在政党的合并或解体过程中，该党的原有支持者很难全部被新成立的政党或其他政党吸收为“政党支持者”。例如，根据对同一选民的追踪调查，在1994年2月日本新党的139名政党支持者中，经过1994年12月日本新党解体后并入新进党这一政治过程，至1995年3月，仅有35.4%的原日本新党支持者进一步演变为新进党的政党支持者，而近28%的原日本新党支持者则转为“无党派阶层”。[9]

其四，主要在野党的“在野性”不足。众所周知，在“1955年体制”时期，执政的自民党主张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日美同盟和修改宪法，而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则主张日本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中立和维护宪法，二者的政治主张界限分明、相互对峙。“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各政党虽按执政与否可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但除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明确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立场并显示出鲜明的反对党色彩以外，其他各党的政策主张大都难分彼此。90年代末期以来，民主党作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在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无任何本质差别，且民主党的领导成员也来自于自民党内较为左倾的派别，两党的差异仅仅表现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或在某一问题上坚持的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无党派阶层的大量增加及“脱党化”现象，并非源于选民对政治的不关心，而是他们对9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状况强烈不满的具体表现。因此，目前的无党派阶层是“教育程度较高、对政治关心较强的选民。这些人之所以有时拒绝政党和选举，是因为还没有发现值得支持的政党”[10]。

三 无党派阶层与后自民时代

自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重新出任内阁首相之后，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政权结构形式先后从“自社先”（即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执政）、“自民党单独”、“自自”（即自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执政）、“自自公”（即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三党联合执政）发展到2000年的“自公保”（即自民党、公明党、保守党三党联合执政），“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日本政党政治正进入以自民党为首联合执政的后自民党时代。对此，有的日本学者提出“1996年体制”说，认为它绝非“1955年体制”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不同的体制特征，即：自民党在国政选举中不具有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的能力；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成为基本的政权框架等。[11] 也有学者认为，事态的发展“正向着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方向前进”[12]。

在后自民党时代，无党派阶层作为日本选民中的“最大势力”层而进一步影响政党政治走向。例如，根据1996年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46.3%的选民加入了诸如政党、个人后援会、农协、工会等某种组织，同时政党支持阶层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为45%—46%，选民的组织加入率与政党支持率大体相当，而国政选举中的最低投票率是1995年参议院议员选举时的44.5%，因此投票率为45%—46%的选举完全是“组织战”，投票率若达到60%，则掌握大选胜败的关键将是无党派阶层。[13] ③

在1996年大选中，自民党的议席数由选举前的211席增加到239席，虽未过半数，但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大选胜利。原因在于自民党的“基础票”发挥了作用，“浮动”的无党派阶层大多没有参加投票，采取了弃权行动。无党派阶层在本次大选中的态度是希望政权稳定，主张“尽早举行大选”的只是极少数。[14] 随后，在获得社会、先驱新党两党“阁外合作”的形式下，自民党一党慎重地运营政权，并在数次地方选举及众参两院议员补缺选举中获得胜利。正因如此，前景预测较为“乐观”的199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对自民党而言是个重大打击。

在199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不仅没有恢复单独过半数所必需的69个议席，而且也大大低于改选前的61个议席，当选者仅为44人，遭受了该党参议院选举史上最严重的惨败。特别是在东京、爱知、大阪、埼玉、神奈川、京都等无党派阶层聚集的选举区，自民党候选人竟无一人当选。在通常情况下或许弃权的许多选民，因对桥本内阁的经济政策不满而前往投票站投票反对自民党。

在2000年6月大选中，自民党所获议席由众议院解散前的271席跌至233席，议席的减少依旧集中在无党派阶层聚集的城市选区。其中，在东京都25个小选区中，民主党获得13个议席，远远超过自民党的8席。在大选前后，根据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无党派阶层中55%的选民对“自公保”联合政权持否定态度，主张“延续‘自公保’联合政权”的仅占4%。[15] 此外，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努力争取市民阶层的支持。虽然2000年大选中民主党在无党派阶层较多的大城市地区的小选区中获胜，但其得票在相当程度上应被看做是“反自民党票”而非民主党的“固定票”。例如，根据大选中的舆论调查，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具有政权担当能力”时，回答为“民主党”者仅占全体选民的9%，在无党派阶层中也仅占7%；关于“对民主党的评价”方面，只有17%的选民对其抱有“改革的期望”，58%的选民认为其“与自民党相同”，即使在无党派阶层中也有半数以上认

为其“与自民党相同”，对其不抱有“改革的期望”。[16] 实际上，同自民党一样，民主党也未能有效、牢固地吸引广大的无党派阶层，以至于2001年初日本国内出现了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招牌组建“都市新党”的动向。

21世纪初期，哪个政党能有效地吸收、消化大量的无党派阶层，是事关构筑何种政党体制的重要课题。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历程来看，无论自民党执政与否，其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在1993年和1996年大选中均获得2200万—2300万张选票，2000年大选中在公明党的支援下又获得2400万张选票。这2200万—2300万张选票基本上是自民党坚固的组织票源，其政党支持率大体在22%以上。粗算一下，在一亿选民中若投票率为45%，则在4500万张选票中自民党将很有可能轻松获得半数以上议席，即投票率越低就会对自民党越有利。为了维护和巩固“组织票”，自民党正通过预算和补助金的分配等手段来加强对支持组织的利益诱导。但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重新获得无党派阶层的支持对自民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在日本社会日趋多元化、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情况下，自民党的支持基础确实在缩小。此时，自民党一心只顾维护剩余支持者，对农村的依存度增强，并更加强化特权政治。只要这种防守的态势不改变，其支持基础将不可避免地愈加缩小。这使人不能不感觉到今日的自民党正走向一条与社会党自我灭亡相类似的道路”[17]。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危机感，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以“改变自民党”的姿态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其“改革无禁区”的口号也获得了国民的普遍欢迎与认可。在2001年7月参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在121个改选议席中独获65席，比改选前增加了4席，走出了1995年、1998年两次参议院议员选举接连失败的阴影。对此，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坦然承认，“主要是依靠首相的人气”，党的势力尚未完全恢复。[18] 受“小泉人气”的影响，33.4%的无党派阶层的选票投向了自民党，与三年前的11%相比，增加了二倍以上，而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在无党派阶层选票中所占的比例则从29%降至22%。[19] 在2003年11月大选中，自民党为了在城市地区获得广大无党派阶层的支持，据统计小泉纯一郎总裁在12天的选举战中有八天是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圈游说，在他举行的62场街头讲演中三大城市圈占到70%以上。[20] 尽管如此，大选的结果却是自民党所获议席数由选举前的247席降至237席，这既表明众议院议员选举不同于参议院议员选举，同时也明确验证了“小泉人气”的限度。相反，在大选前的2003年9月，以小泽一郎为党首的自由党与以菅直人为党首的民主党合并成立新的“民主党”，该党所获议席数则由大选前的137席增至177席。朝野两大政党之间的议席数差距在缩小，日本的政党体制似乎又一次向着两党体制的方向靠拢。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无党派阶层在此次大选中的投票行动不同于以往的国政选举。根据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在实施调查时投票态度明确的无党派阶层中，在比例区支持自民党和支持民主党者分别占36%和41%，在小选区支持自民党和支持民主党者则分别占41%和39%，无党派阶层的投票行动呈现出由“各党分散型”向“自民、民主集中型”演变的强烈倾向。[21]

总之，不论是自民党重建一党优位制还是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实现轮流执政，再次吸纳广大的无党派阶层并获得其支持，将是影响日本政党体制如何转型的关键因素。否则，若广大的无党派阶层长期游离于议会民主选举之外，则可能使21世纪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面临着极大的瞬间爆发性。

（责任编辑：韩铁英）

[1] 昇味準之輔『現代政治——1955年以後』（下）、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631頁。

[2] ジェラルド・L. カティス『「日本型政治」の本質』、ティビエス・ブリタニカ、1987年、225頁。

[3] 堀要『日本政治の実証分析』、東海大学出版会、1996年、90-91頁。

[4] 猪口孝「政党支持率の変遷」、時事通信社編『戦後日本の政党と内閣—時事世論調査による分析』、時事通信社、1981年、72頁。

[5] 橋本晃和『「新・無党派」の正体』、東洋経済新報社、1995年、80頁。

[6] ジェラルド・L. カティス『「日本型政治」の本質』、226頁。

[7] 橋本晃和『「新・無党派」の正体』、53-57頁。

[8] 内田健三他『日本政治は甦るか—同時進行分析』、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7年、198頁。

[9] 内田健三他『日本政治は甦るか—同時進行分析』、74頁。

[10] 金熙德等：《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31頁。

[11] 高島通敏『「九六年体制」下の日本政治』、『世界』1999年7月号。

[12] 佐藤誠三郎『新・一党優位制の開幕』、『中央公論』1997年4月号。

[13] 田中愛治『「無党派層」こそ政策を重視する』、『潮』2000年7月号。

- [14] 内田健三他『日本政治は甦るか—同时进行分析』、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7年、160頁。
- [15] 『朝日新聞』2000年6月26日。
- [16] 小林良彰『総選挙・解説有権者の投票行動』、『世界』2000年8月号。
- [17] ジェラルド・L. カティス『自民党は第二の社会党か』、『中央公論』2001年2月号。
- [18] 『朝日新聞』2001年7月30日。
- [19] 『日本経済新聞』2001年7月30日。
- [20] 《日本大选结果揭晓》，《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0日。
- [21] 『朝日新聞』2003年11月4日。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